

七日談

(香港篇)

香港竹棚大戲的粵劇情懷

何志平

今年三月，屹立北角五十三年、有「粵劇殿堂」美譽的香港最後一家民營戲院——新光戲院，熄燈結業，退出歷史舞台。很多市民前去告別影相留念。在他們心中，新光不單是一家戲院，更是香港粵劇文化的縮影，以及無數戲迷的精神寄託。大堂天花板上的一百零八盞波波燈、全港最深最寬的舞台樂池、前排觀眾不會擋住後排視線的逾千個座椅，都在細訴香港幾代人在新光睇大戲（看粵劇）的往事。

我第一次現場看粵劇，是五六歲時與祖母一起。

那時每逢喜慶節日，祖母總會拉着我與弟弟，一家大小在晚飯後乘車到九龍的荔枝角逛荔園遊樂場。遊樂場不僅各式小吃讓人垂涎欲滴、流連忘返，還有雜耍、大戲表演等各類活動。我們東逛西溜，先看看動物園裏的大烏龜、大象，再在碰碰車、小攤遊戲、鞦韆、蹺蹺板上玩得不亦樂乎，最後一定是跟着祖母在大戲竹棚前坐下看粵劇。祖母痴迷粵劇，在家常邊做事邊聽電台播放的粵劇，偶爾情不自禁還會跟唱幾句，於是我從小也聽得多了。

我至今猶記得開場表演前的鑼鼓喧天，只見身着艷麗閃亮服飾、背上插旗或頭上有兩條長纓的演員，在只有一桌兩椅，簡單的舞台

上轉來轉去，手一會兒高高舉起，一會兒輕輕揮動，嘴裏咿呀呀地唱着，可我就是一句都聽不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竹棚戲台，既通風散熱也散音，還沒有擴音揚聲器及字幕說明。但祖母聽得可入神了，或隨戲的節奏搖頭晃腦，或手輕輕打着拍子。我只好貼在姨婆的耳邊問個不停，才能略知劇情一二。後來功課越來越重，那些幼時無所顧忌的看戲日子和繁鬧場景，如同一副寫意畫，成為我長大後的夢想，只能不時閃現在時光的童話裏。在祖母去世後，便再也沒有了。

其實，粵劇在香港並非孤立的文化存在，它是中原雅樂、嶺南俗調與漂洋文化碰撞的產物，且其流變史本身就是一部鮮活的香港城市文化志。香港在粵劇發展史上走過的日子，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二〇〇三年，香港民政事務局開始聯合廣東省文化廳、澳門文化局，策劃粵劇申遺工作，並將每年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定為「粵劇日」，以拓展傳統文化、弘揚粵劇藝術。二〇〇六年，其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二〇〇九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粵劇「輕鬆靈脆」，唱腔悠揚，旋律優美，既有高亢激昂的激

越之聲，又有柔和細膩的抒情之韻。表演形式豐富多彩，包括唱、念、做、打等多種手法，分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幫花旦、丑生、武生六大類行當。粵劇之美，美在聲韻，美在弦音，美在妝容，美在編排……有時領略一場粵劇展示，好似感受一篇靈動散文，看表演者把文中韻味一一展現。粵劇從前便深受香港人喜愛，如今依然如是。民眾亦可在卡拉OK中點唱，《帝女花》更是首支蘊含於內的粵曲，現時依舊街知巷聞，且對香港電影影響甚深。

香港粵劇根深脈植於珠江三角洲「紅船戲班」。據一八四一年報紙記載，「來自佛山的廣府班」在水坑口搭竹棚戲台，演出《六國大封相》等骨子老戲。戲班延續明代弋陽腔「錯用鄉語」之傳統，將中原官話與粵語融合，形成「梆黃合流」聲腔體系。之後為適應港口觀眾流動性強的特點，粵劇發展呈提綱模式，僅列故事大綱，演員臨場發揮「爆肚」（即興念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達至高峰。粵劇大師們還常循碼頭工人、洋行職員的不同口味調整唱詞，甚至在《胡不歸》中加入英文俚語。粵曲中也夾雜了小提琴、大提琴、色土風等樂器，盡顯嶺南的實用文化氣息。

香港首部粵劇電影《白金龍》



▲在香港因應節慶搭建的戲棚除了傳統表演，場內也設有各式攤位，吸引許多年輕觀眾。

在一九三三年公映。影片保留了粵劇「開面（勾臉譜）」的化妝傳統，但將舞台切末（道具）簡化為電影布景，並通過唱片技術放大演唱腔，形成銀幕唱腔傳播範式，片尾加入粵劇常識問答字幕，實為早期戲曲普及教育。一九五九年《帝女花》中出現「戲中戲」獨特類型，在其中演繹粵劇《香劫》，這種戲曲結構讓粵劇突破舞台局限；還專門請來鑼鼓師傅，將粵劇「一板三眼」轉化為電影背景音樂節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恐怖片《殭屍先生》、《鬼打鬼》等，都有採用粵劇唱腔、臉譜繪製、戲服圖案等元素。

在申遺成功後，香港掀起「實驗粵劇」浪潮：如用多媒體投影替代傳統舞台背景；使用VR場景演繹唱段，觀眾透過頭顯體驗沉浸式觀戲；唱段融入電子音效等。然而這

些創新褒貶不一，大部分老年觀眾反對粵劇電子化，青年觀眾佔比則逐年提升。

這些傳播場景恰是香港粵劇文化韌性的證明，霓虹燈下掩藏着跨海遷徙與時代變遷中的變奏樂章。其之所以是人類文化遺產，只因它與流行藝術的轉變存在莫大關係，卻不是流行文化。現今，年輕人最愜意的時光是玩手機看電腦，網絡世界何其精彩。我只有想像，或許有一天，在後輩子孫的耳邊也響起哇呀呀的唱腔。即使他們聽不懂在唱些什麼，可敲鑼打鼓的聲音同我幼時那般，一直敲打至記憶深處，縱然暮氣蒼茫也不會輕易逝去。廣東大戲，不只是音樂、戲劇、藝術，抑或故事，是一代人抹不去的記憶，更是我們回不到的過去。

秋風裊裊，穿過那年竹棚戲台……

回溯珍貴照片與報刊史料

《香港巴士百年光影》探尋公共交通歷史

香港街頭的巴士來來往往，是無數人日常的一部分，也是一段被書寫了百年的交通歷史。香港歷史博物館專家顧問鄭寶鴻近日發表新作《香港巴士百年光影——從公眾電機車、街坊汽車到巴士》，整理大量珍貴照片與舊報資料，重構巴士在港發展的來龍去脈。他提到，根據過往一些被忽略的史料，香港的公共汽車服務其實早於一般認知，甚至可追溯至20世紀初。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

在整理香港早期交通史資料的過程中，鄭寶鴻於香港大學圖書館發現了一則《華字日報》1909年的新聞報道，記錄當時已有由紅磡開往尖沙咀、經黃埔船塢的收費交通工具，稱為「公眾電機車」，票價為「一毫紙」。「當時一毫紙對普羅大眾來說很重要，因為那時候一個月的工資可能只有兩元到五元左右，搭車都要仔細考慮。」

「巴士發展比1920年代更早」

1910年的資料又提供了另一幅畫面——愉園遊樂場曾經設有接駁巴士，專門載遊客前往鵝頸橋一帶。這些片段打破了「巴士始於1920年代」的普遍印象，把香港公共汽車服務的源頭，推前到20世紀初。

在這本新書裏，鄭寶鴻特別整理了近三百張歷史照片與舊車票，部分來自私人收藏。他笑稱：「有些車票上印着的地名，今天看可能一頭霧水，但我們慢慢查，對照報紙和地圖，竟能拼出當年的交通路線圖。」這些線索也勾勒出早期巴士公司的發展軌跡：1920年代，像「香港仔街坊汽車公司」、「香港大酒店汽車有限公司」這類街坊自發營運的小型巴士公司，已來往於香港仔與中環之間。「我們發現1921年5月，街坊汽車已經通車，甚至早於九巴幾個月，行經大口環、盲人院、華富村，路線很貼近社區需要。」

隨着時代發展，不少名字熟悉的企業也曾經營巴士服務。電車公司最盛時期不只經營電車，連港島與九龍的巴士也一手包辦。在此之中，鄭寶鴻特別留意各公司在車票與車身設計上的差異。他說：「電車公司的巴士是綠色，大酒店的是黑色，九龍有時是紅色，中巴曾用紅黃配色。看車身顏色就能分辨是哪家公司。」

巴士文化亦隨時代變遷

除了車身顏色外，鄭寶鴻亦談到巴士相關的文化細節——車廂廣告設計、還有文言



▲約1971年尖沙咀碼頭總站的巴士。書中插圖。

文味十足的舊站牌等。「以前站牌會寫『如要停車，乃可在此』，報紙還會笑這句話太斯文。現在只剩三個大字：『巴士站』，（雖然）感覺乾脆直接，卻少了以前的味道。」

巴士的乘車方式與制度同樣經歷多番變遷。過去乘車要先在總站買票，中途上車的乘客甚至無法登車。售票員需熟記每一段票價與票種，一趟車程下來，得處理五六種不同顏色的票，還要分樓上樓下、頭等二等。此外，亦要兼守門員，幫乘客拉門下車。「壓力大到『癲』」，售票員經常被乘客罵。」他笑說，有一次乘客與售票員因補票問題起爭執，最後竟鬧上法庭。最多人投訴的地點，是如今皇崗口岸所在的一個人流密集的站點，幾乎天天都有糾紛。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香港全面引入「一人控制」巴士制度，「上車入錢」變成標準程序，售票員也逐漸消失。從此，巴士標語換上了「此車由一人控制，乘客於上車時繳費」的新字樣。

鄭寶鴻感慨，書中很多史料都是首次公開，「這本書希望透過照片、車票和報紙文獻，還原一個更早期的交通歷史面貌。」書目編輯林雪伶則補充，這不僅是一本關於歷史的書，更是社會文化的記錄，讓人理解過去的日常與集體回憶。



▲約1930年，卜公碼頭前空地可見三輛綠巴士，以及一部黑巴士。書中插圖。

「望車石」趣聞

「以前等巴士常常要等很久，車又少，大家就站在路邊一動不動，一直盯着馬路看，久而久之，就像一塊『望夫石』那樣。」鄭寶鴻回憶說。這種久等不來、望眼欲穿的情景，在戰後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非常普遍，甚至成為報章漫畫的題材，被戲稱為「望車石」。

「那時候九巴經常被投訴不準時，報紙乾脆畫出一

群人在路邊等車，等到像石頭一樣，表情哀怨又無奈，結果大家反而覺得有趣。」鄭寶鴻笑說，這個說法不僅反映當時的交通狀況，也折射出香港人生活節奏中「等待」的耐力。如今公共交通班次頻密，市民已難以想像過去一班車要等上一小時以上的情况，這些由等車延伸出的詞彙與畫面，成了今日難以再現的舊香港風景。



▲《香港巴士百年光影——從公眾電機車、街坊汽車到巴士》收錄大量珍貴照片與舊報資料。

曾經的「干諾道東」

今日的夏慤道，早年其實名為「干諾道東」。「1960年代，金鐘一帶有一段路當時叫做『干諾道東』，二號雙層巴士也會經過。這段路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不少市民上下班的必經之處。」鄭寶鴻透露，隨着金鐘地區重建、道路擴闊及命名重整，這段路於1968年前後改稱「夏慤道」，原名亦逐漸淡出市民記憶。



▲巴士售票員需熟記每一段票價與票種，圖為兩種不同顏色的車票。

